

鄞州文史



第二辑 (2006 年)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办

鄞州文史

YIN ZHOU WEN SHI

第二辑 (2006 年)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主 任 朱禹宝
副 主 任 王飞龙 张嘉俊
委 员 姜芬琴 朱富国 许忠园 鲁宝明
邵永国 曹怀玉 戴松岳

《鄞州文史》编委会

主 任 张嘉俊
副 主 任 姜芬琴 邵永国
委 员 戴松岳 谢富国 张忠良 朱亚萍
徐 敏
主 编 戴松岳
副 主 编 史晓卿

主 办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编 辑 《鄞州文史》编辑部
地 址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邮 编 315100
电 话 0574-87523806
传 真 0574-87523832
E-mail daisy@nbyz.gov.cn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陈 勇
刊名篆刻 史晓卿
印 刷 宁波精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10月

目 录

特别报道

- 民国《鄞县通志》影印版出版发行 史芸飞 (001)
- 民国《鄞县通志》:一部巨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吴海霞 (004)
- 《鄞县通志》再版前言 文献委 (009)

鄞州人物

- 翁文灏与抗战期间的西南大开发 乐承耀 (015)
- 当代预测大师翁文波 章国荣 (027)
-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 孙善根 (033)
- 留得真情在人间
——记薛祉镐先生 薛恭稼 薛恭稚 (042)
- “八行公”史诏 陆婉慈 (051)

名人纪念

- 崛起南宋鄞人时代的宰相——史浩 郑传杰 (057)
- 南宋宰相史浩的慈善事业考略 俞信芳 (079)
- 简论史浩心学的几个重要观点 张如安 (087)

望族研究

- 砌街李氏谱系简考 袁 慧 (093)
- 一门俊杰 百世流芳
——明代钱氏家族述略 戴松岳 (110)

浙东学派研究

- 李杲堂的方外交游 梁一群 (122)
- 全祖望论高丽使馆 方祖猷 (137)

佛教文化

- 鄞县大梅山考 杜建海 (143)
- 话说杖锡寺 冯炜达 (151)
- 鉴真东渡与古明州 王重光 (162)
- 天童禅风播东瀛
——日本佛教曹洞宗与天童禅寺法脉因缘 陈定萼 (166)

鄞城往事

- 六朝政局中的宁波地域与宁波人物 唐燮军 (171)

宁波帮研究

- 明代的宁波商人 钱茂伟 (182)

中外交流

- 来甬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初探 谢振声 (190)

山川风物

- 试论鄞州南宋墓葬和堪輿术 杨古城 曹厚德 (202)
- 鄞州东钱湖的史氏墓葬 理查德L达芙斯 裘露燕译 (209)
- 心智之物——宁波工艺美术掠影 吴海霞 (213)

文化学术

- 论明代陈沂的诗论与创作 张如安 (219)
- 高明《琵琶记》与栎社沈氏楼 郑超 (234)
- 鄞州的藏书文化 朱富国 (242)
- 蜗寄庐主家淮孙先生藏书始末 俞信芳 (249)

史事钩沉

- “藉我外兵，以备他盗”
——试释张苍水的海陆同仇设想 周冠明 (257)

尘世旧影

- 堕民·堕贫·堕鄙嫂 翁绍初 (260)

堇山鄮水

千年商埠横溪村 俞珠飞 (263)

书画艺术

文人书家张于相 史 波 (270)

张琴(峰桐)先生事略 张 侗 (277)

沙耆在韩岭的日子 史美章 (285)

旧文新读

鄞县参事会开幕记 时事公报 (295)

稿约 编辑部 (298)

民国《鄞县通志》影印版出版发行

史芸飞

9月28日下午，区政协、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举行民国《鄞县通志》影印版首发式。区政协主席朱禹宝、副主席张嘉俊、秘书长姜芬琴等参加首发式。

《鄞县通志》创修于1933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4月最终印竣，被称为“所有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县志。该志记叙范围涵盖鄞县全域，即今宁波市海曙、江东、鄞州三区和江北城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等。共36册，计51编，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全志约550万字，近万页，并附地图一函。由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即马涯民）纂。《鄞县通志》编纂中由于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手段。如以现代科学的气象和气候学理论记载鄞县的气象，以经纬度定地址，以注音字母标读音等。所以在我国方志史上，《鄞县通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来为方志界所推重，也为科学界所关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在介绍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时以《鄞县通志》作为代表，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则盛赞该志为“古今方志第一”。

由于民国《鄞县通志》的种种优异特点，所以它极受外国汉学家的推崇。《鄞县通志》在国外的流行正如宁波帮在国外的活动一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者提高了外国商人与宁波通商的兴趣，而前者则提高了外国汉学家对宁波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外国学者对宁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重要原因是民国《鄞县通志》起了很大作用。一些国外著名的汉学家都对《鄞县通志》推崇备至。日本大阪大学的教授斯波义信认为，像《鄞县通志》这样的地方志，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认为《鄞县通志》是中国地方志的杰作，

使他大大增加了对于宁波近代的城市发展及其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信心。为此，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宁波研究室，并把《鄞县通志》的全部内容编成计算机语言输入了计算机。于此可以看到《鄞县通志》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是多么令人自豪。

这样一部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巨作，她的成书却历经坎坷。从创议修纂到印竣发行，前后历时18年，历经8年抗战、3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献身于这一事业。作为历时18年，凝聚数百位编纂人员和董事心血的《鄞县通志》是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丰碑。她是反映鄞县人民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真实记录；是保存鄞县文化的宏伟宝库，是传承鄞县传统的如虹桥梁。她的成书过程本身就体现了百折不挠、勇于创新、敢为人先、踏实干事的鄞县精神，是一部值得后人一次次阅读的地方百科全书和地域文明的教科书。

朱禹宝在首发式上说，这部享有盛誉的《鄞县通志》在鄞州已难觅书踪。连区档案馆所藏的《鄞县通志》也残缺不全，仅存的志书也多线断页散。为此，区政协于2005年6月成立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后，当即邀请宁波市的文史专家进行座谈，到会专家一致呼吁尽快再版《鄞县通志》，以保存地方文化，传承鄞州传统。于是，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决定再版《鄞县通志》。

朱禹宝还说，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下，经过一年半的工作，《鄞县通志》影印版宣纸本终于在国庆前夕出版了。这是历史上印刷最为精良、质量最好的一种版本。《鄞县通志》的再版发行，将有助于联络港澳台和旅居国外的甬籍同胞，让他们通过这部志书了解家乡的历史和自己的文化之根，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从而激发起爱乡爱国的情，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完成多作贡献。本志的再版发行必将有助于文化界、学术界对宁波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从中总结深厚的鄞州精神和宁波精神，为建设和谐的鄞州、和谐的宁波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文化的支。本志的再版发行将让更多的鄞州人民和宁波人民有机会通过这部家乡的百科全书来了解这方神奇土地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从而激发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巨大热情，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首发式上，区政协领导向宁波市档案馆、宁波市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天一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鄞州区委党校、鄞州档案馆、鄞州区图书馆、鄞州中学、鄞州区党史办等10家单位赠书。中国地

方志珍藏馆、天一阁同时赠送了珍藏证书。

区委党校副校长张善庆代表受赠单位发言，感谢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为我区文化建设和文明传承作出的贡献。他还表示，区委党校也将积极为我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民国《鄞县通志》 一部巨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吴海霞

36册线装本，一函地图，装满整整两只箱子，目前再版的民国《鄞县通志》，宣纸影印，包装考究，将这部550万字的方志巨著风貌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部历时18载终于完工的巨作，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县志，因最终完成于1951年，而被称为“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沉甸甸两大箱书的背后，是一段沉甸甸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轻轻翻动书页，73年前的光阴静静地流淌而过。

上篇：漫漫修志路，矢志不移

从战争阴影下的1933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后，从中山公园的薛楼，到韩岭梅园，动荡的时代，纷飞的战火，经济的困顿，工程的浩大，人员的聚散，一部志书的编成就这样贯穿着血泪和磨难，也浸透着一代人的智慧、才学和意志，体现着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的鄞州精神。

顶着战争阴云而上

鄞县在清代最后一部县志是同治《鄞县志》，因成书于光绪初年，又称光绪《鄞县志》，而在此后的60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鄞县的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巨变。为此，到了上世纪30年代，鄞县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重修县志。

1933年元旦，一项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帷幕，鄞县通志馆在宁波中山公园薛楼开馆编志。大家公推张传保、赵家荪为通志馆馆长，聘请了著名地方志专家、慈溪人陈训正为县志总纂，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定海人马瀛先生任编纂主任。

此时，战争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华的天空，鉴于时局，陈训正和马瀛凭借自己多年修志书的经验，决定将全志分为六志，每志单独成编，合则成为通志，以便随编随印，随装随发，即使受到战争影响也可能完成其中数志留给后人。

这一决定，也预示着他们已对乱世间的修志工程可能遭遇的艰难，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

情势也果如所料。刚开始的两三年，《食货志》、《舆地志》、《工程志》及地图陆续编成，到1936年夏天，《工程志》装印完成，藏于浙江图书馆的孤山分馆。其他各志也大体成形，只剩下《文献志》。但此时的华东地区已是危机四伏，杭甬交通时续时断，浙江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准备内迁，《鄞县通志》的排印之事也不得不暂时搁起。到抗战爆发时，通志馆同时又面临了经费拮据的危机，从馆长到采编校人员130余人便不领薪水，坚守岗位。

每天只能排一页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宁波，城内一片混乱，通志馆也随时可能被炸，在这种局势下，通志馆只得遣散编采人员，仅留编纂主任马瀛等4人。这几名最后的留守人员，在日机的轰炸中，竭尽所能，想出应对之策。他们把馆内的档案及将发的志书，秘密藏于鄞西广善寺，还掉借来的书籍、宗谱等资料，马瀛还和一名编辑带着未完成的志稿，迁居到慈溪（今慈城镇）的西郊二六市。同时，浙江图书馆印刷所将剩下的排印资料，也寄到二六市，非常时期，马瀛依然一边校对，一边继续编纂《文献志》。

9月，战火已经蔓延了过来，浙江图书馆转移内地，印刷所停工，《政教志》的印刷工作也因此停顿。马瀛当机立断，将尚未印刷的《政教志》原稿照相缩小，共拍了1700多张，底片密封后保存在天一阁，后来又随天一阁转移到龙泉山区，洗印的照片密藏于慈溪乡下，原稿随浙江图书馆转移到浙南，如此“狡兔三窟”，煞费苦心，可见其形势之严峻，责任之重大。

1938年，浙东局势稍缓，马瀛当即将《文献志》中的《人物》编抽出，交与华丰印刷局印刷。这时华丰印刷局搬到鄞西的集士港，只有一台脚踏印刷机，两三个排字工，每天只能排一页，到1941年初，才排完《人物》上、下册。

更大的厄运猝然而至。1941年4月，日寇攻陷宁波，华丰印刷局将印成的志稿散页藏于集士港林氏宗祠的暗室中，随即厂停人散。但日伪军侵占集士港后，搜出印成的志稿，或当引火物，多作拭污用，呕心沥血编

印之书竟被糟蹋一空。通志馆转移到广善寺的档案账册，也被日伪搜毁无遗。城中的通志馆更在劫难逃，书物器材搜掠一空，而且墙毁屋塌，满目疮痍。马瀛在慈溪乡下连闻恶讯，五内俱焚，悲不自禁。

在困顿中，将修志进行到底

1944年，修志工作又出现一丝转机，浙江省政府在云和县成立浙江通志馆，向沦陷区各县征集省志资料。这时鄞县县政府退驻宁海，了解到通志馆已停办时，决定将通志馆改名鄞县修志馆，属鄞县文献馆管辖，并续聘马瀛为编纂主任，设志馆于韩岭梅园。

但当时正处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县财政拮据，志馆人员薪水微薄，每人仅发糙米数斗，更无办公经费。一直到1951年《鄞县通志》最后部分的印刷终于完成，修志馆始终没能摆脱经济上的困顿及由此带来的人心浮动、工作停滞的艰辛局面。

在无法编纂的情况下，志馆人员只能将《文献志》稿誉录一份，把《政教志》的照片用显微镜映写出来，分藏在韩岭山中的洞穴中。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颠簸的修志馆终于迁回中山公园旁边办公。

1949年5月，《文献志》第六册在艰难中装订成册，正好也迎来了宁波的解放。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志馆工作暂时停顿。不久，宁波市军管会文教部接收了修志馆，但馆中人员薪水仍由董事会支付，印刷事宜，也由志馆自行安排。因为国民党军队封锁出海口，沪甬交通中断，募款无法到位，志馆人员已两个多月未领薪水，人心不稳，一些人员或躲或逃，或辞职他往。张传保、马瀛等人只得用所存瑞典白报纸折印刷费，寻求印刷单位。但由于工程浩大，资金缺乏，因而各印刷厂都不愿承接。几经周折，国营甬江印刷厂慨然承命，愿意代为印刷。

1950年3月，《鄞县通志》继续开印，1951年4月，《鄞县通志》在编纂18年后终于完工。

下篇：盛世再版，文明传承添光彩

著名汉学家施坚雅教授在他任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宁波研究室，并把《鄞县通志》的全部内容编成计算机语言，输入进去。他认为《鄞县通志》是中国地方志的杰作，通过这部著作，增加了他对宁波近代的城市发展及其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信心。

如果说被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誉为“古今方志第一”的民国《鄞县通志》，其漫长的编纂过程是一代修志人耗尽心血的记录，那么半个多

世纪后再版的影印本，则体现了当代鄞州人对文化建设和历史传承怀有的使命感。再版是对地方文化的整理与解读的开启，其间也包含着艰辛的付出和殷切的期望。

再版过程中的诸多波折

民国《鄞县通志》再版过程中遇到的波折，比起成书18年漫长岁月里的坎坷，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乏为此书顺利面世而支持、奉献的各界人士。

宁波出版社的沈建国是此部巨著再版的责任编辑，他告诉记者，早就有让《鄞县通志》再版的心愿了，作为出版社的编辑，他眼中的这部方志是他在编辑地方文化书籍过程中引用率最高的书，可见其价值。

沈建国的这一想法，和宁波市文史界的一些专家们不谋而合，契机则是在去年6月，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的成立，在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的鄞州区地方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关于民国《鄞县通志》的再版就浮出水面。鄞州区政协主席、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任朱禹宝表示，在我国方志史上，《鄞县通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来为方志界所推重，将这部志书的风貌完整地呈现，对研究鄞州历史、弘扬地方文化、挖掘鄞州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个月后，民国《鄞县通志》再版开始筹划，鄞州区政协和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都非常关注这项工程，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下，投入60万元资金，影印再版民国《鄞县通志》，并撰写了6000余字的再版前言，对民国《鄞县通志》的成书过程和文献史料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对再版民国《鄞县通志》的原因和目的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这次再版采取宣纸线装版本，共500套，每套包括36册书籍、一函地图，这样的出版规模在宁波也不多见。

首先面临了寻觅全套的原版《鄞县通志》的难题。岁月嬗递，良书难觅，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连区档案馆也找不到一套齐全的《鄞县通志》，即仅使存的一些《鄞县通志》，也多线断页散。书海茫茫，通过有关人员的多时奔波，在天一阁、图书馆、宁波大学等单位搜寻原版志书，还通过一些线索，找到了一些私人藏品，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终于搜齐了多种版本的《鄞县通志》，经过比较，选择善本，影印出版。

宁波出版社编辑沈建国眼看着自己多年的梦想就要在手中实现了。凭经验，他认为出影印本应该是省心的事，扫描下来就行了，连校对都省了。没想到原版的志书不仅纸张泛黄、变质，还因为版本不一，有铅排的，有铜字的，字体也大小不一，在扫描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处笔画粘

住，斑斑点点的状况，需要重新处理修整。于是，沈建国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对着9000多张菲林片，一张一张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复。

更大的困难是那些地图，最大的一张是80厘米×160厘米，扫描和印刷都成问题，这样规格的纸如今也不容易找。这件事真把出版社的同志给难住了。几经联系，最后找到一家房产公司，有专门用于工程地图的扫描仪，将那张大地图分三次扫描，然后拼接而成。后来又找到温州一家印刷包装材料厂，印刷也解决了。这次再版的《鄞县通志》影印本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印刷最为精良、材料最为高档的版本。

经过一年半的工作，民国《鄞县通志》宣纸影印版于9月26日印竣，由于篇幅浩大，每套分上、下部，100套书就装满一辆卡车，当最后一套放入库房时，已是晚上九时了。但工作人员都充满了成功的欣慰。

通过志书，了解我们的文化之根

民国《鄞县通志》是一座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丰碑，是反映鄞县人民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真实记录，是保存鄞县文化的宏伟宝库，更是一部值得后人一次次阅读的地方百科全书。

它的再版也因此有着重要意义。鄞州区政协主席朱禹宝认为这部书可以让这一代的鄞州人了解地情，感知传统，也可以让海外的鄞州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自己的文化根源，这部志书还为建设和谐鄞州、和谐宁波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文化的支撑。

再版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少单位和个人争相订购，对此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当书还在印刷厂的时候，无论是区政协还是宁波市出版社都会接到询问的电话，因为此次再版数量有限，不少读者表示，即使不能整套拥有，看上两眼，亲眼目睹一下这套书的风采也很过瘾。

民国《鄞县通志》再版，也让我们看到了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为鄞州文化建设所作的努力。据朱禹宝介绍，在新时期的政协文史工作中，整理地方文献、挖掘地方文化、弘扬地方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此，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正抓紧这方面工作。接下去还有《鄞州百村》、《万斯同全集》等多本关注地方文化的书籍将要出版。《鄞州文史》作为研究、宣传鄞州地方文化的刊物要不断提高质量，扩大影响。保护、挖掘、研究地域文化，将更多原生态的东西呈现出来，将更多有着深厚底蕴的东西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鄞州，热爱鄞州，为建设鄞州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鄞县通志》再版前言

文献委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国的“方志之乡”。这不仅是在现存古志方面声名远扬，唐宋时，就编纂了《明州图经》。在传世的32种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宁波就有4种，在11种元代志书中，宁波更占3种。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志》被称为“四明六志”，在中国志坛上享有盛誉。而且还有着以保存地方志而闻名于世的中国第一古藏书楼——天一阁。而在佳志迭出的方志之乡宁波，其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志书无疑是编竣于1951年的《鄞县通志》。

《鄞县通志》创修于1933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4月最终印竣，被称为“所有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由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共36册，计51编，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全志约550万字，近万页。记叙范围涵盖鄞县全域，即今宁波市海曙、江东、鄞州三区和江北城区等。并附地图一函，计26幅。全志不仅内容浩博，篇幅巨大，而且体例新颖，名称特异。以县志而冠名“通志”，曾遭非议，马瀛(字涯民)为此写一文以辩，认为“通”既纵贯古今，又横汇事物，乃方志中最完备的形式，而且由于其在编写过程中采用当时先进的科学手段。如它以现代科学的气象和气候学理论记载鄞县的气象气候，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记载地质、岩矿和海洋，用现代科学的动植物知识记载地方的动植物，每种动植物除记载单名外均附以拉丁文的二名法，还以经纬度定地址，以注音字母标读音等。所以在我国方志史上，《鄞县通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来为方志界所推重，也为科学界所关注。著名的方志学家洪焕椿称道此志“是浙江一部规模最大、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在介绍民国时期的方志编

修时则以《鄞县通志》作为代表，称“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则盛赞该志为“古今方志第一”。

由于民国《鄞县通志》的种种优异特点，所以它极受外国汉学家的推崇。《鄞县通志》在国外的流行正如宁波帮在国外的活动一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者提高了外国商人与宁波通商的兴趣，而前者则提高了外国汉学家对宁波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外国学者对宁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重要原因是民国《鄞县通志》起了很大作用。一些国外著名的汉学家都对《鄞县通志》推崇备至。日本大阪大学的教授斯波义信借助《鄞县通志》进行研究，成为著名的研究宁波学者，他认为像《鄞县通志》这样的地方志，才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和夫人曼苏恩教授都是研究中国的专家。施坚雅教授认为《鄞县通志》是中国地方志的杰作，使他大大增加了对宁波近代的城市发展及其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信心。为此，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宁波研究室，并把《鄞县通志》的全部内容编成计算机语言输入了计算机。于此可以看到《鄞县通志》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是多么令人自豪。

这样一部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巨作，她的成书却历经坎坷。从创议修纂到印竣发行，前后历时18年，历经8年抗战、3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理念、意志完成了这一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通志。为后代留下了这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鄞县在清代最后一部县志是同治《鄞县志》，因成书于光绪初年，又称光绪《鄞县志》。自光绪《鄞县志》编修至上世纪30年代初的60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鄞县的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巨变。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变化，1932年，鄞县人士开始酝酿重修县志，鄞县著名士绅、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张传保发起修志，祖籍慈溪（今慈城）侨居鄞县的赵家荪鼎力合作，于是设立了鄞县通志馆，公推张传保、赵家荪为通志馆馆长，并聘请著名地方志专家、慈溪人陈训正为县志总纂。1933年元旦，鄞县通志馆在宁波中山公园薛楼开馆编志。由于陈训正时任杭州博物馆馆长，不能在宁波编志，所以通志馆又聘请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定海人马瀛（涯民）先生任编纂主任，主持纂修工作。马涯民与陈训正是姻亲，两人合作编过多部志书，素为方志界推崇。陈训正和马涯民借鉴所修志书经验，拟编出《鄞县通志》纲目，鉴于当时日本已占领东三省，又

覬觎关内，战争阴影渐浓的时势，决定将全志分为六志，每志单独成编，合则成为通志，以便随编随印，随装随发，即受战争影响也可能完成其中数志留给后人。通志馆分聘各科专门人才进行采访、编辑，陈训正则利用杭州博物馆的藏品，独编《博物志》。1935年至1936年，《食货志》、《舆地志》、《工程志》及地图陆续编成，至1936年夏天，《工程志》装印完毕，藏于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其他各志也大体成形，只剩下《文献志》尚未编纂。一代名志已露冰山之角，编纂人员信心倍增，加紧编纂，然而战争的阴云已布满华东，《鄞县通志》的编纂进入了艰难的战争岁月。

1936年，日本侵华野心毕露，华东地区危机四伏，杭甬交通时断时续，浙江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准备内迁，《鄞县通志》的排印之事也不得不暂时搁起。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正常的社会生活被战时状况替代。募捐款项无法落实，经费日益拮据。为此从正副馆长到采编校人员130余人，不领薪水，义务工作。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宁波，城内一片混乱，市民纷纷逃难。通志馆也随时可能被炸。在这种局势中，通志馆只得遣散编采人员，仅留编纂主任马涯民先生等4人，后来敌机轰炸愈烈，马涯民等人把馆内档案及将发志书密藏于鄞西广善寺，还掉借来的书籍、宗谱等资料，随及马涯民与一名编辑携带未成志稿迁居慈溪（今慈城镇）西郊二六市。浙江图书馆印刷所将尚剩的排印资料，寄到二六市，马涯民一边校对，一边继续编纂《文献志》。

1937年9月，战火蔓延浙江，浙江图书馆转移内地，印刷所停工，《政教志》辍印。马涯民当机立断，将尚未印刷的《政教志》原稿照相缩小，拍了1700多张，底片密封后保存在天一阁，后随天一阁图书转移到龙泉山区；洗印的照片密藏于慈溪乡下；原稿随浙江图书馆图书转移浙南，以确保稿子不致全部遗失。1938年浙东局势稍缓，马涯民当即将《文献志》中的《人物》编抽出，交与华丰印刷局印刷，时华丰印刷局迁至鄞西集士港，仅有一台脚踏印刷机，二三个排字工，每天只能排一页，至1941年初，才排完《人物》上、下两册。志书修纂就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中依然进行着。

就在这时，更大的厄运猝然而至，1941年4月，日寇攻陷宁波，百业俱废，华丰印刷局将印成的志稿散页藏于集士港林氏宗祠的暗室中，随及厂停人散。不久日伪军侵占集士港，搜出印成的志稿，或当引火物，或作拭污用，呕心沥血编印之书竟被糟蹋一空。志馆移藏在广善寺的档案账册，也被日伪搜毁无遗。城中的通志馆更难逃厄运，书物器材，搜掠一空，直至墙毁屋塌，满目疮痍。马涯民在慈溪乡下的二六市家中连闻浩劫